

大禹治水与长江早期文明*

顾人和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南京 210008)

提 要 水是大自然最富才华的艺术家, 是它塑造了雄奇的长江三峡; 水又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源泉, 是它孕育了灿烂的长江文明.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的上古历史是一部人类同洪水共存的历史, 许多古史传说都与水有关. 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 是长江洪水频频发生的历史时期. 大禹是中华民族广为传颂的治水英雄, 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夏王朝的奠基人. 大禹治水的故事发生在大约四千年前, 他的足迹遍及华夏大地. 中国古代地理学名著《尚书·禹贡》载述, 大禹从上游开始经三峡地区一直疏导到长江的中、下游河段, 书中曾多处提及禹从事疏浚长江河道制服洪水的水利活动. 又据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的记载, 大禹治水还到了位于江汉平原的古云梦泽. 《水经注·江水》则明确指出, 三峡河道是大禹开凿和疏通的.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尤其在太湖流域, 大禹治水的传说广泛流传, 对大禹的崇拜与信仰也极为盛行. 考古发现, 在长江三角洲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缺失地层中, 淤泥厚度达1~1.5 m. 一些专家认为, 那是4000a以前发生于良渚文化末期的那次特大洪水留下的痕迹.

关键词 大禹 治水 长江文明

分类号 P532

1 大禹治水的神话与历史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 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时期. 夏朝总共传14代, 先后延续了近500年. 夏王朝的建立, 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标志着延续数万年之久的原始社会的基本告终, 而往后持续了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则从此开始. 在华夏大地从蛮荒走向文明、中华民族自形成而走向壮大的重要历史转型期, 大禹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卓越刚强的人格, 创建了治理洪水、统一国家的伟大功绩, 不愧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

禹, 在民间通常被尊称为大禹, 与尧舜并称为古代传说中的三大圣王, 又相传为夏朝的开国君主. 在传说中, 禹家世极其显赫, “黄帝之玄孙而帝颡顼之孙也”. 禹的父亲即鲧, 帝舜时因治水无功被放逐而赐死. 禹继承其父未竟的事业, 帝舜任命其官职为司空, 其主要使命就是治水.

记载大禹治水事迹的古代文献最早可见于《尚书》与《诗经》. 在青铜器“齐侯钟”上, 可见“咸有九州, 处圻之堵”的铭文; 在“秦公簋”和“秦公钟”的两处铭文中,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271027, 40371112)资助. 2003-08-10 收稿; 2003-12-15 收修修改稿. 顾人和, 男, 1947年生, email: rhguten@sohu.com.

也都出现过禹的名字.近年间在香港古董市场偶然发现一件名为“遂公”而堪称国宝的青铜礼器,礼器当为西周中期某一代国君遂公所用.其内底部铸以铭文10行98字,字体优美,行款疏朗,被考古学界誉为“金文之最”.铭文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墮)山,浚川...”,从该青铜礼器的断代分析可以确认,关于大禹治水文献记载的历史记录因此而提前了700a.

几乎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神话时代,神话的主人公大多具有超越自然的力量,而神话产生的社会思想基础是万物有灵的泛神论世界观.马克思认为:“任何神话都是使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1]”.黑格尔则充分肯定神话记述的史料价值,他在《美学》中指出:“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生活在诗的氛围里.他们不用抽象演绎的方式,而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把他们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转变为认识的对象^[2].”

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我们既可以把大禹治水的传说视为神话文学,又可以把它当作上古历史来阅读.自汉代开始,史家就把禹作为夏王朝的开国帝王写进了史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古代最权威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同样也详细地记叙了大禹的生平事迹.今天我们之所以认为大禹曾经治理过三峡,治理过长江,不只是根据至今还在长江流域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而主要是根据古籍的记述中透露出来的种种信息.翻开先秦古籍,几乎随处可见关于大洪水的触目惊心的叙述:

“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昏垫.”(《尚书·夏书》)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

“洪水滔天,鯀窃帝之息壤,以填洪水.”“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堙洪水.”(《山海经·海内经》)

“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淮南子·本经篇》)

就是到了春秋时期,洪水依然连绵不断,从《左传》的编年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每隔十年就出现大水的记载.

我国古代史籍记述许多关于大禹的传奇故事,的确具有不少令现代人难以置信甚至说违背现代科学的内容,充满了神化与夸张的文学色彩,但我们可以肯定,大禹治水的传说中必定涵盖了许多历史真实的成分.史籍透露的种种信息表明,我国古代的先民们确实曾经遭遇过一个漫长的“洪荒”时代.

2 关于大禹治理长江洪水的历史记载与神话传说

《尚书·禹贡》在记述大禹治水的历史事迹时,多处提及大禹致力于疏通长江的支流和长江干流.“番冢导漾,东流为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导番冢,至于荆山”;“导岍及岐,至于荆山”;“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另外,《史记·夏本纪》中还有“云梦土为治”的记载(“云梦”指位于今日江汉平原的古云梦泽).这说明大禹治水的足迹从长江上游的众多支流水系经过三峡直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

现代禹贡学派创始人先贤顾颉刚先生认为：“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关于大禹的神话是“自楚传至中原”的，“中原民族自周绍王以后，因封建交战而渐渐与南方民族交通，故穆王以来始有禹名见于《诗》、《书》”^[3]。他在注解上列《禹贡》、《史记》等关于大禹在长江流域治水的文字时作了以下描述：“甘肃、四川间的岷山，汉中间番冢山，雅安的蔡山和蒙山，都给禹收拾过，可以种植五谷，安定人民了。汉中的汉水（即漾），甘肃的西汉水，流到四川的嘉陵江（即潜），川西坝子的沱江，经过六省（按旧说）的长江，都给禹疏导过，可以代灌溉和行船了^[4]。”

大禹治理洪水采用的方法，大约是接受其父失败的教训，以疏导为主。如孟子所说，“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他不是用人工的力量执意与大自然对抗，而是因势利导，顺其自然，给洪水寻找出路，他采用的战略部署是“疏九河，濬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设法将各路洪水导进长江，排入大海。

三峡为长江之咽喉，疏导长江的治水工程艰难之最当然要算开凿三峡了。众多古籍除《蜀王本纪》有“时玉垒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的记述外，还记载了大禹开凿三峡的种种传说。《水经注·江水》记载：“江水又东经广溪峡，斯乃三峡之首也……其峡，盖自昔禹凿以通江，郭景纯（郭璞）所谓巴东之峡，夏后疏凿者。”则明确指出三峡是大禹开凿和疏通的。历代著名诗人同样也以优美的诗句来歌颂大禹的这一功绩。有道是“往来行旅弊，开凿禹功存”（唐 孟浩然《入峡寄弟》）；“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唐 陈子昂《白帝城怀古》）；“伟哉神禹功，疏凿此山川”（宋 范成大《初入巫峡》）；“山川夔路险，疏凿禹功名。”（清 王士正《黄陵庙》）；“禹功何巍巍，尚睹镌凿痕。天不生斯人，人皆化鱼鼃”（宋 陆游《入瞿塘登白帝庙》）。

大禹公而忘私和艰苦奋斗的道德精神，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代代相传。《尚书》记述了禹娶涂山氏之女为妻，新婚仅三四天，便出发治水的故事。《孟子》载：“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史记》的说法是“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大禹长年在外出治水，一心为公，无暇顾及家庭，顾及儿女私情。据《庄子·天下篇》载：“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禹立志为天下黎民兴利除害，他身为治理洪水的最高长官，能够长期与广大民众一起栉风沐雨，共同奋斗在抗洪第一线，其含辛茹苦甚至于到了面容憔悴，骨瘦如柴的地步。大禹光辉道德的高大圣人形象，恰恰是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中树立起来的。

3 大禹时代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考古学文化略述

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与大禹时代相当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晚期屈家岭文化及石家河文化，从其形态来看，可能大多是“三苗”部落的遗存。重要的考古发现有一系列不同等级聚落的城址，面积一般在 $20 \times 10^4 \sim 30 \times 10^4 \text{ km}^2$ 的规模，其中以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城址尤为壮观，城内面积达 $120 \times 10^4 \text{ km}^2$ 。中心城址还修建了高大的城墙、宽阔的城壕、大型高台建筑与祭坛。此外还有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浣、石首走马岭等城址，说明城市景观的兴起已成为当时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5]。

在石家河遗址发现的大型城址，城墙外有宽达数十米的护城河。护城河的有些地段是

利用天然河道,有些地段则是人工开挖而成。倘若仅仅是用于军事防御,修筑如此宽阔的河道似无必要。根据其地貌的形态与走势,可以认为抵御洪水侵袭同样是这些城墙和城河的主要功能。可以想见那个时代在长江中游地区,水患已经对人类社会构成巨大威胁,而人们正试图探索如何与洪水协调共存。在农业经济领域,稻作技术与生产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出现了人工营造的水稻田,而且还出现了比较简易的灌溉设施;小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刚刚开始,尚不具备明显的社会分工特色,而其产业布局往往与原料产地相关。

位于长江三角洲的环太湖地区,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在那里前后延续了一千来年。气候与环境的显著变化,可能是其晚期文化衰落的主导原因。有些环境考古学家认为,良渚晚期的气候较前期变得低温多雨。由于地下水位显著上涨,使原先位置较低的广阔田野沦为湖沼,加上光热条件不足,使以稻作为主体的农业经济生产力受到很大挫折,从而削弱了良渚文化集团的社会政治实力,最后导致良渚文化时代的衰落。气候与环境的急剧变迁,虽然不一定是良渚文化走向衰亡的唯一或直接的原因,但可能是其中相当关键的原因之一。

4 大禹的历史功绩

以蚩尤为首“三苗九黎”,是指古史时代大部分居住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广大南方民族。由于当时蚩尤已经掌握冶炼技术,生产力比中原地区先进。《史记·五帝本纪》记述:“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与人语,铜头、铁额、食沙造五兵,仗刀战大弩。”当时蚩尤拥有先进的兵器,农业与渔业十分发达。在发达经济生产力的支撑下,其军事势力不断扩展,直接威胁到居住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东夷和西部高原地区的戎夏族,所谓“三苗九黎”的侵扰,长期以来一直成为北方王朝的严重边患。尧、舜时曾长期征讨,直到大禹时代才逐渐将战乱控制平服。由于苗、黎等民族不再北侵,加上长江中游地区洪水得到治理,民生有了基本保障,国家从此出现了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

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特别注意指导各地发展农业生产,安排人民生计,特别是在治水患的同时还统筹考虑到兴水利,开挖沟渠,应使其兼备排水和灌溉的双重功能。《尚书》记载禹“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洫距川”,意思是大禹不但疏通了大江大河,还组织兴建了农田水利系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大禹还“令稷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大禹懂得因地制宜,提倡在地势低洼的区域种植水稻。由此看来,后稷一生的事业是忠实地贯彻了禹大力发展农业的既定方针。因此,大禹作为华夏农业的始祖,同样是当之无愧的。

古史记载的大禹主要有四个伟大功绩,一是“丰水东注,唯禹之绩”;二是“四方攸同,皇王维辟”(《诗·大雅》);三是他在南北各地广泛推行了“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尚书·吕刑》)的农业生产方式,引导民众进入安居乐业的农耕文明时代;四是“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尚书·吕刑》)。大禹通过治水活动树立了崇高的政治权威和亲民形象,为后来建立各部落方国之间的联合政体和统一的国家政治制度铺平了道路。他创立了以疏导为主体的治水方法体系,并从治水实践中总结出“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的所谓“六府三事九功”的东方文明模式。大禹倡导的这个文明模式,不仅成为后来中国历朝历代建国的政治宗旨,而且形成了古代东方文明的象征。

5 有关大禹故里的辩论和日本文化根源于长江的说法

关于大禹出生于蜀地的说法,最早见于战国时期成书的《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己,修己背剖而生于石纽”。西汉文史家杨雄在《蜀王本纪》中记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魏晋时代皇甫谧在《帝王世家》中作了以下的注解:“孟子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出西羌,是也。”那么石纽究竟在哪里呢?四川人大概从来都不去怀疑大禹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其事,也从不怀疑大禹就是四川人,但是自明清以来,汶川县与北川县的地方官员和当地知识分子却为大禹出生地的“石纽”究竟应归属何地而争论不休。论辩持续了好几百年,想不到这样的论争到20世纪80年代会再度兴起而达到高潮。至今多数人认为,大禹故乡应是北川县禹里羌族乡的“禹里沟”,被古史记载为“禹出汶川”的四川省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汶川县,则因为古迹证据的缺乏而在这场争论中甘拜下风。司马迁在谈到大禹生于西部时,曾经论及古代中国东西部地缘政治与文化兴衰的相互作用关系:“或曰:东方物所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起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史记·六国年表》)。

近几年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些历史学者曾专程到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此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些学者针对日本的古代神话与中国“大禹诞生”传说以及蜀地岷江上游古代地域文化的许多相似之处进行了探讨,因而推定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必然的内在关连。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贺登教授在一篇题为《古代长江流域文化和日本》的论文中,详细论证了日本“神武天皇的众多传说是根据中国巴蜀的开国传说编写而成”的观点。他在对羌族历史文化的实地考察中,特别注重收集流传在民间的关于大禹的神话传说。古贺登教授在他的论文中谈到:“中国的开国传说也伴随着治水-建国这样的梗概。大禹治水的传说为其代表,川西的羌族人至今仍然确信禹是自己的祖先。”他又说,日本“文化的根源,并不在于北亚游牧民族的文化,而在于长江流域的太阳信仰的养蚕、养鸕鷀的稻作文化”^[6]。

参 考 文 献

- 1 戈宝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307
- 2 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276
- 3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集).上海:中华书局,1988:179
- 4 顾颉刚.顾颉刚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74
- 5 张绪球.长江中游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67
- 6 冉光荣,王藤元男等.四川岷江上游历史文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4-7

The Watercourse Regulation Masterminded by DAYU and the Nonage of Yangtze Civilization

GU Renhe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AS, Nanjing 210008, P.R. China)

Abstract

Water is a great craftsman who has sculptured the Three Gorg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water is also the headspring of all the life on the earth that has nurtured the resplendent Yangtze Civilization.

To some extent, the Chinese immemorial times was a long history in which the Ancients coexisting with the Flood. The YAO-SHUN-YU era in myths was the period when the Yangtze Noachic Flood happened frequently.

DAYU is a great ancient hero widely known for his water-control in Chinese mythology and legend. He was the founder of the first unified kaiserdom-XIA dynasty. The famous story about DAYU's water-control was happened 4000 years ago. One of Chinese geographic sutras *Shang Shu-Yu Gong* recorded that DAYU had triumphant dredged up the mainstream and many bran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other sutra *Shui Jing Zhu* has mentioned that the watercourse of the Three Gorges of the Yangtze River was excavated by DAYU.

The legend about DAYU's water-control is widely spreaded and the deep adoration to DAYU is prevalent in Yangtze delta, especially in Taihu basin. In several stratum of the Neolithic age where deficient of culture trace massive mud was deposited. According to certain expert, that is the result of the Flood happened 4000 years ago.

In Taihu region of the Yangtze delta, refulgent Liangzhu Culture continued some thousand years. The climate in the last period of Liangzhu Culture became more and more cold and wet. The rapid variance of the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is not direct or only causation but a important factor of the comedown of the famous ancient Culture.

Keywords: DAYU, water-control, Yangtze Civilization